

纯粹纯洁的地方是我出发的地方



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

人物

索南才让,蒙古族,1985年出生于青海。在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《山花》《民族文学》《作品》《青年作家》等杂志发表作品,主要作品有《荒原上》《巡山队》《找信号》《哈桑的岛屿》。作品曾入选2020《收获》文学排行榜,《小说选刊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等选刊以及《2020青春文学》《2021中国短篇小说20家》《2021中国微型小说年选》《2022中篇小说年选》《收获中篇小说五年选》等多种年度选本。曾获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佳作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、青稞文学奖、红豆文学奖、青海省青年文学奖、青海省“德艺双馨”文艺工作者称号、青铜葵花儿童文学奖、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各种奖项。2022年,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。

3

我是从童心的一个点上开始的,纯粹的纯洁的地方是我出发的地方。

会说话,比如有思想。我想问的是,你真的能和它们对话吗?什么才是人与动物共用的语言?

索南才让:牲畜们很有意思。比如说马,我只要一看到它的眼睛,一看它那个动作,我就知道它在想什么,它要干什么。还有,它那个眼睛在戏弄你和在恐惧你是完全不同的。牛也是,害怕你的时候是一种眼神,故意在气你、戏弄你的时候,又是一种眼神。牲畜的聪明是难以想象的,而对牲畜的观察是很多牧人都具备的,它来源于几千年相互依存的纽带关系。我们牧人平常跟它们打交道,很多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把它们放在一个同等的,甚至是我们势均力敌的一个位置上。因为你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和战斗力,要不然你不是它的对手,它会把你控制得死死的,会在日常的生活里戏弄你,你又追不上它,你又打不到它,你拿它没有办法,但它却可以把你气个半死……往往这时候,我们的警惕心和战斗的欲望就会提高到最高。因为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,一旦你示弱,你三番两次成为它手下败将,那你以后就有苦日子可过了,因为它会产生一个念头,觉得你不行,不是它的对手。这样的话,作为一个牧人,你放什么牧啊?所以很多时候,所谓的牧民和动物的对话,其实就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竞争和对抗的一个过程。

青年报:在你的文学世界里,牧民和牲口是平等的,是一种“互养”的关系,不过,我们养牲口的目的是利用。那么,书写这种平等,或者说是“互养”关系,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?

索南才让:这种护养关系不必达到什么效果,而且它很简单,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方式,它也一点都不矛盾,我们不存在“矛盾中生存”这样的境地,因为牧人辛辛苦苦养育它们,供吃供喝,照顾它们,让它们躲避天灾,躲避自然危害,让它们可以一代又一代地稳定的繁衍,那么反过来,它们就需要回馈,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付出,更不可能有免费的牛

餐。牧人和牲畜的关系其实就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,而且是自然法则中最自然的、最成功的一部分。我在养你,你也在养我,我们互惠互利,形成一种在自然中生存的平衡关系。

青年报:动物说话和思考,只有童话世界才会存在,但在现实世界里,这恰恰是人和动物的区别。你能否结合具体的作品,谈谈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是什么?

索南才让:我觉得用动物的方式去思考人比较有意思。哪怕是这个所谓的动物式的思考,依然是以人的思维方式在形成一种思考和谈论,那也是不一样的,区别就在于你首先要把自己放到对方的位置上开始,不是说一定要从对方的位置上开始,你永远没有办法以一匹马的方式,一头牛的方式,乃至以羊或者狼的方式去思考我们人和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,你没有办法,因为你不是真正的它。你只能假装你是,你只能把你的思维灵魂舍弃,甚至是强行地占据到它的躯体上,短暂地,很荒诞地进行这样一种反思,我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,因为你跳脱了人的范畴,而跳脱人的范畴意味着更大的可能性,哪怕这个可能性最终的结果也是错误的、可笑的。所以我很喜欢让我小说中的动物们去思考、去说话,那头牛它就按照人的方式去思考,它甚至想回归到人的社会,它又想回归到纯粹的牛的社会,但都做不到,最后它成了一个既不是人也不是牛的东西。但它是自由的,它活成了独一无二的个体。我觉得现实中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个体,那太难了。只要我是人,我就有无数分身存在于这个世界,我也是无数人的一个分身之一。我没有办法把自己从中单独地、完全地独立出来。我是人之万分之一而已。所以我只能在作品中去实现一种真正的个体性的东西,哪怕不伦不类。事实上,只要是独一无二的,就是不伦不类的,就是世界的对立面。我觉得这就是我文学中的现实和真正的现实之间的关系。

青年报:你多次提到路遥的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对你的影响。路遥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巨大变化,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熟悉当时的生活了,却依然能引起共鸣。文学作品中永不过时的东西是什么?

索南才让:路遥先生的小说在过去我刚开始阅读严肃文学作品的时候,给予了我巨大的精神鼓舞。励志性的东西是很需要的,而励志的精神,尤其是青少年的时候是非常需要的。所以我才对路遥先生始终心怀敬意。因为他的作品里面有一种人的巨大的精神能量。这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,都永远需要且永不过时。我们需要一种精神,甚至需要很多种精神,而这些精神从什么地方来呢?它是怎样产生的呢?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伟大的作家往往都是产生精神能量的作家。路遥是这样的,托尔斯泰是这样的,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,曹雪芹同样是这样的。

青年报:你的两部长篇小说饱含着童心,《荒原上》弥漫着青春气息。你是1985年出生的,已经接近不惑之年,经历也比较沧桑,在这纷纷扰扰的社会,你是怎么给自己的心态“保鲜”的呢?

索南才让:其实我在创作这些年中,一直想要努力保持一种状态,那就是纯真的一颗心,就像童心一样。我想让我的心灵纯粹一点、纯洁一点、纯真一点。我始终坚信,美好的文字,直击心灵的文字,产生的那个地方一定是干净的。对我来说,很多时候我不会刻意地去考虑成年人的文学和儿童文学之间的区别。我的很多短篇小说都可以当做是儿童文学,但我创作的儿童文学像《哈桑的岛屿》,它也是一部给成年人看的文学作品,为什么呢?因为无论如何,我在出发的时候,都是在童心的一个点上开始的,或者说一个纯粹的、纯洁的地方就是我出发的地方。我拒绝成为一个十

分成熟的人。我不想成为一个世事洞明、圆滑老练的,经历世事而古井不波的人。我反对,我抗拒。我要让自己始终处在一个不成熟却也不愚蠢的位置上。

青年报:你曾经戏称自己是“职业作家”。不管怎么说,文学是不景气的,光靠写作估计还不能养家糊口。你目前的生存状况如何,或者说你目前是靠着什么生活的?

索南才让:其实我说到职业作家是因为这两三年来,我确实是以写作为主要的工作。每天我就像上班一样,早晨六点到工作室,晚上六点到家,雷打不动每天十个小时会在工作室里面阅读、写作。我觉得这就是职业作家,我还没有考虑到我要完全依靠写作来养活自己,因为那不可能。目前我还是靠着我的牧场来生活。

青年报:你的最新长篇《找信号》入围了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节。这是要进行影视改编了对吗?凡是有影视改编价值的小说,要有一个好故事,也就是可读性要强。你认为,思想性与可读性哪个更重要?

索南才让:其实我觉得有很好的可读性的作品,思想性差不到哪里去。比如像《静静的顿河》,思想性差吗?它的故事性能够让你一看就会进入到那个世界里面。再比如《白鹿原》,还有很多世界名著,思想性、可读性都是无可挑剔的,都是很棒的作品。像余华的《活着》,可读性不强吗?思想性不好吗?所以说,你只要写出了可读性特别棒的故事,那就会有一种思想在支持着这个故事,因为没有好的思想支持的故事,不可能有好的可读性。

青年报:现在是普通话时代,大家从小都学普通话,平时又都说着普通话,作家大多数都是用普通话写作。我看你的作品也一样,除了人名地名和少量的方言词汇,基本用普通话写作,这样的

好处是比较利于阅读,不利是少了韵味。你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,有着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语系,你怎么看待千篇一律的文学语言问题?

索南才让:我觉得语言的问题不是说我们都在用同一种语言写作,就会显得我们的作品面貌是趋于一致的,我认为不是。一副面孔可以幻化万千,还得要看作家对汉语的感受所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风格。所以这是一个风格的问题,它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。我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,我说的是青海方言,也说蒙古语,我周围既有说藏语的,说蒙古语的、说汉语的,又有说地方方言的,所有这些语言形成的环境对我创作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,我还是会很自然地,甚至几乎是根深蒂固地从本民族的语言出发,好多时候需要将内心形成的一句话——它是母语——转换成汉语,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,我自然而然会把它更标准化地书写成汉语。但是它不妨碍我在这个文本的转化中形成我自己的一种风格,哪怕这个风格一直在变,极其不稳定,我都觉得是很好的。

青年报:现在的年轻人都沉迷于网络,乐于碎片化的、轻松的阅读,而你的作品让人读了以后,心灵会得以宁静。你觉得读书对年轻人的人生有何意义?

索南才让:我觉得不读书的和读书的年轻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,就是因为读书人在以读书的方式去思考,去经历。他得以把自己的灵魂世界营造得广阔而富饶。他的灵魂经得起惊涛骇浪的冲击和蹂躏,他在更多的层面和更多的时候为自己创造需要的东西。